

南
京
大
学
博
士
文
丛

苏伊士运河危机 与英美关系

杨冬燕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NANJING
DAXUE
BOSHIWENCONG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苏伊士运河危机 与英美关系

杨冬燕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伊士运河危机与英美关系/杨冬燕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0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ISBN 7-305-04126-2

I. 苏... II. 杨... III. 苏伊士运河问题—影响—英美关系—研究 IV. ①D856.12②D8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6486 号

丛 书 名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书 名 苏伊士运河危机与英美关系
著 者 杨冬燕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3596923 025-3592317 传真 025-3686347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信箱 nupressl@publicl.pt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字数 180 千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ISBN 7-305-04126-2/K·279
定 价 12.00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蒋树声

副主任 洪银兴 陈 骏 张异宾(常务)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帆	王 颖	叶继元
孙义燧	李 成	吕 建
任天石	陈 骏	宋林飞
张异宾	吴培亨	柳士镇
郭子建	洪银兴	钱乘旦
龚昌德	童 星	蒋树声
程崇庆	赖永海	谭仁祥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总 序

洪银兴

21 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从根本上说,21 世纪的竞争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使命,博士是高层次人才的代表。如何培养大批具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使他们在下世纪成为知识创新的主力军,无论是对高校本身还是对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为了展示南京大学青年教师的学术风采,加强学科与学术队伍的建设,促进新生学术力量的成长,经过长期酝酿与充分准备,我校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此次编进《博士文丛》中的论著,大多是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我校任教的青年教师的博士论文,是在广泛动员、严格把关的基础上,根据质量第一、公平公开、规范

苏伊士运河危机与英美关系

运作的原则认真遴选出来的,同时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特别注重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对南大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说,这套《博士文丛》虽然也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基本上反映了南大青年学者丰富而活跃的学术思想,代表了南大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此次我校组织编辑出版《博士文丛》,就是从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并着眼于下世纪发展的需要,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领域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相信《博士文丛》的出版对于扩大我校的学术影响、培养青年学术骨干、推动学科建设,一定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南京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各个方面都致力于追求卓越,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这一人才摇篮里茁壮成长,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在这块科学沃土上勤奋耕耘。近百年的办学实践塑造了南大师生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博采众长、汇融百家的开放精神和兢兢业业、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培育了南京大学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学风。近百年的历史,尽管世事沧桑,但这样的精神和学风一直在南京大学传承延续,并不断发扬光大,历久弥新。正是这种优良的传统和学风,使南京大学深深植根于传统与现代的沃土中,不断从本民族和世界文化的宝库中吸取新的营养,形成了南大特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学术氛围,使南大在近百年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永不衰竭的青春活力,使学校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特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南京大学已成为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强大、科研实力雄厚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重点综合性大学。

一流的大学离不开一流的学术大师,一流的学术大师又离不开一流的学术环境。在迈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南京大学将一如既往,继续改善条件,为广大教师创造更好的学术环境。

总 序

同时我也衷心希望全校教师尤其是广大中青年教师,发扬我校优良传统与学风,在南大优良的学术环境里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为进一步提高我校的学术水平,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1999年5月20日

前 言

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和战争是一次复杂的国际事件，也是冷战时期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这次危机虽然只持续了几个月，但它所引起的后果却是长久的，远远超出了中东的地区范围。诸如：难以解决并不断加深的阿以冲突；英法老牌殖民主义在中东殖民政策的受挫和它们力图保住自己在该地区的势力而同阿拉伯国家产生的矛盾；西方对苏联在中东势力渗透的恐惧；美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对中东的新政策；保护西方石油生命线的需要以及当地民族主义力量所引起的不稳定——所有这些复杂而又相互牵连的问题最终导致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和战争的爆发。

在这场危机和战争中，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势力以及犹太复国主义侵略势力都有充分的表演，以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反帝、反殖、反霸力量，在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的生死搏斗中一显身手。斗争的结局同西方主要肇事者的主观愿望恰好相反：英法欲霸住运河，结果反而被挤出中东，挤走它们的不是别人，而是伙同英国挑起危机的盟邦美国。运河危机和战争期间美国外交的首要目标是阻止苏联势力打入中东，结果反而让苏联的中东外交赢得了重要的一分。埃及人民击退了老殖民主义，但未能根本摆脱新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的祸害。危机和战争导致中东国际政治格局的改组，新老殖民主义之间持

苏伊士运河危机与英美关系

续数 10 年的明争暗斗宣告结束,英国势力基本撤出中东,美国则出笼了对中东的新政策——艾森豪威尔主义,这标志着美国势力将大举进入中东,中东成了美苏争霸的舞台。

苏伊士运河事件先后导致了英国和法国政府的改组。新上台的法国戴高乐推行的是一种不再追随美国的“独立外交”;而英国新组阁的麦克米伦政府也一改依赖美国的外交政策,加强同欧洲国家的关系,保持自身的强大。这种变化对日后的国际形势、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虽然在 1956 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以后的 20 多年里,有不少的回忆录和对危机的一般陈述问世,但第一部以美国档案资料为基础研究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代表性专著,则是在 1981 年出版的唐纳德·内夫(Donald Neff)的《苏伊士的斗士们》。^① 这个出版物的面世标志着英美对 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研究的第一阶段的结束。

在《苏伊士的斗士们》这本书中,内夫同情纳赛尔。认为,以色列在 1955 年 2 月对加沙埃及军队的血腥袭击是导致 7 个月后埃及向苏联购买武器的原因。埃及这一举动引起华盛顿和伦敦的恐慌。为了拉拢纳赛尔,英美在 1955 年底决定援助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工程,但事隔不久,他们却以纳赛尔的反西方言论为由,于 1956 年 7 月愚蠢地取消了对埃及的援助。作为回击,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之后,英国首相艾登秘密地同法国和以色列谋划,准备对埃及进行军事干涉。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则试图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多边会议,以外交方式解决危机。当艾登借口以色列对西奈的闪电袭击危及运河安全而悍然采取军事行动后,艾森豪威尔施展外交手段,在联合国谴责英国,对英国实行非正式的石油禁运以及对英国实施经济制裁,迫使英国最终于 1956 年 12

① Donald Neff, *Warriors at Suez: Eisenhower Takes America into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1981.

月从埃及撤军。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档案的开放和美国文件的不断解密,大西洋两岸的英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对内夫的部分观点进行了提炼,对另一部分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们对加沙袭击的意义几乎没有疑义,但对纳赛尔是否像内夫希望人们相信的那样毫无过错则产生争议。认为,以色列对加沙袭击只不过是给埃及提供了一个向克里姆林宫倾斜的借口,埃及实际上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才同苏联进行交往的。^①另外,基思·凯尔(Keith Kyle)和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分别在他们的文章和书中进一步论证了内夫有关英美援助埃及之动机的观点,认为英美对阿斯旺水坝的援助是它们对苏埃武器交易所采取的一种勉强的举措。不论是伦敦还是华盛顿都没有认真对待此事,直到最后形势无法挽回。^②

苏伊士运河危机和战争留给世人的教益甚多。英美学者对它的研究随着英美档案的不断解密而深入。笔者拟就英美学者关于苏伊士运河危机和战争的外交史学做出概述和简析。

一、关于英美分歧的探源

苏伊士运河危机涉及到的国家主要有英国、美国、法国、以色列、埃及和苏联,其中危机对英国的打击最大,它使英国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重创。在伙同法国和以色列一起对埃及发起进攻不到

① Steven Spiegel,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 Making America's Middle East Policy, from Truman to Reagan*, Chicago, 1985, p. 66~71; David Schoenbau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New York, 1993, pp. 107~109

② Keith Kyle, *Britain and the Crisis, 1955~1956*, 载 Louis and Owen eds., *Suez*, 1956, Oxford, 1989, pp. 103~109; William J. Burns, *Economic Aid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Egypt, 1955~1981*, Albany, 1985.

苏伊士运河危机与英美关系

一个星期,英国就被迫接受对它来说是耻辱的停火,这不是因为在战场上的失败,而是因为自身英镑的崩溃、联合国的反对以及苏联可能进行的干涉。在所有这些的背后是美国政府公开和私下的对其盟国的谴责。美国的这一作法在英国看来严重地破坏了两国的“特殊关系”,不仅使英国极不体面地从埃及撤军,而且还改变了英国在中东的命运。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可谓是英美中东关系的一个分水岭。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英美两国在这一事件中分道扬镳呢?英美外交史学界对此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解释。

1. 战略和意识形态因果论

一些学者认为:战略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是构成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因素。研究该事件的英国史学家把两国在危机中的关系作为一个主题进行研究。艾登的传记作者罗伯特·詹姆斯(Robert Rhodes James)的有关美国“出卖”^①英国这一“至理名言”不断被引用,就连在1957年曾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编辑苏伊士运河危机文件的唐纳德·瓦特(Donald Cameron Watt),也在将近30年后他那引起争议的名为《接替约翰牛》的书中指出,“美国乐于运用其政治优势而不在乎要对殖民国家表示尊重、忠诚、尽义务或同它们一致的感情。”^②英国第一位对苏伊士运河事件进行专题研究的作者休·托马斯(Hugh Thomas),在论述英美之间几乎是毫无遮掩的敌对时说,美国在中东“没有传统的利益,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商业关系。他们相信,凭借他们自己早已逝去的殖民经历,他们可以同阿拉伯国家保持友好关系”。^③

① Robert Rhodes James, *Anthony Eden*, London, 1986, p. 516, p. 613

② Donald Cameron Watt, *Succeeding John Bull: Britain in America's place, 1900 ~ 1975*, Cambridge, UK, 1984.

③ Hugh Thomas, *The Suez Affair*, New York, 1967, p. 17

美国学者对此所持的观点同英国学者的相同,也认为美国的反殖与反共是使英美两国产生分歧的原因。威廉·路易斯(William Roger Louis)指出,杜勒斯的反殖民主义,艾森豪威尔的对联合国的支持以及两人的反共产主义使得他们同他们的英国同仁产生分歧,而后者中东政策看上去是无意地干了对克里姆林宫有利的事。^①杰弗里·沃纳(Geoffrey Warner)对反殖民主义一说持怀疑态度,但却坚称遏制及其他冷战措施是导致华盛顿同伦敦在1956年分裂的原因。^②彼得·哈恩(Peter Hahn)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在中东的大战略实际上主要是借助反殖民主义来阻止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抗衡共产主义的。^③

诚然,英美学者对于杜勒斯等人的“反殖民主义”并未做出进一步的实质分析,只信其言而不观其行,未免对美国政策的意识形态特征产生误导作用。

2. 经济竞争说

20世纪90年代初,有些学者开始推翻上述关于英美两国分裂的战略和意识形态因果论,认为经济上的竞争才是促使美国在1956年下半年加快从英国那儿夺取中东主导权步伐的原因。根据托尔·彼得森(Tore Tingvold Petersen)的看法,英美对沙特阿

① William Roger Louis, Dulles, Suez and the Britain, 载 Richard Immerman eds.,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1990, pp. 133~158

② Geoffrey Warn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uez Crisis, 载 *International Affairs*, April 1991, pp. 303~317

③ Peter L. Hahn,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Egypt, 1945~1956: Strategy and Diplomacy in the Early Cold War*, Chapel Hill, 1991, pp. 38~130

苏伊士运河危机与英美关系

拉伯的布赖米(Buraimi)绿洲的争夺加剧了英美之间的紧张。^① 丹尼尔·耶京(Daniel Yergin)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他认为美国官方在1956年11月反对联合王国对埃及发动武装进攻绝大部分是出自这种恐惧,那就是:沙特以及其他反英的阿拉伯国家可能会实施波斯湾石油禁运。或更糟的是,没收西方在当地的石油企业以图报复。^② 斯蒂文·弗赖伯格(Steven Freiburger)把英美在苏伊士问题上的摊牌看作是英国通过把英国赶出阿拉伯世界以及打开中东市场来获取商业利益这么一个单纯计划的高潮。^③ 这是一个同样能引起争议的观点,但却很难使人信服。加布里埃尔·科尔柯(Gabriel Kolko)的经济解释是把苏伊士运河事件放在美国1945年以后的10年中谋求在第三世界的经济霸权这一较大的范畴内^④,有较强的说服力。

3. 主要当事者的个性冲突诠释

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英美两国领导人性格的不和是造成美国 and 英国分裂的主要原因。艾登传记作者罗伯特·詹姆斯(Robert Rhodes James),杜勒斯的传记作者汤森德·胡伯斯(Townsend Hoopes)和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作者斯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把英美双方的疏远归咎于个性的冲突——几乎是病态的不信任使傲慢的艾登和伪善的杜勒斯不能相容;脾气急躁的艾

① Tore Tingvold Peterson, *Anglo-American Rivalr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Struggle for Buraimi Oasis, 1952~1957*, 载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February 1992, pp. 71~91

②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1991, pp. 489~493

③ Steven Z. Freiburger, *Dawn Over Suez: The Rise of American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1953~1957*, Chicago, 1992.

④ Gabriel Kolko, *Confronting the Third Worl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80*, New York, 1988, pp. 77~84

森豪威尔在得知英国故意向他隐瞒他们重夺运河计划时对英国做出了强烈的反应。^① 虽然英国枢密大臣伊夫林·沙克布勒(Evelyn Shuckburgh)坦言艾登和杜勒斯就像是一对剧坛冤家,在苏伊士这个舞台上争夺主角的地位。^② 而且也有资料表明,在1956年秋季,艾森豪威尔确实是对英国感到非常气愤,^③但遗憾的是,个性冲突论者没有认识到这种个人的恩怨实际上只是英美关系发生变化的征兆,决不是导致英美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

二、决策者个人的作用

决策人物在任何历史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来都是毋庸置疑的,但究竟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还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决策中起主要作用,则引起了史学界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杜勒斯是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控制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人物,是杜勒斯提出了对埃及的阿斯旺水坝进行援助,但后来又取消了这种援助,致使纳赛尔收回了运河;是杜勒斯反对英国武力解决运河危机,但却从来没有明白无误地正告英国,反而对英国人大讲要让纳赛尔“吐出来”的话。从危机开始到战争爆发这期间3个多月的外交也都是杜勒斯的杰作。至于艾森豪威尔,则是一个不大管理白宫日常工作的总统。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作是赫尔

① Robert Phodes James, *Anthony Eden*, London, 1986, pp. 469~477; 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Boston, 1973, pp. 166~170; Stephen E. Ambrose, *Eisenhower*, Vol. 2, *The President*, New York, 1984, pp. 359~361

② Evelyn Shuckburgh, *Descent to Suez: Diaries*, 1951~1956, New York, 1986, pp. 185~187

③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Arthur Flemming on 30, October 195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FRUS)*, XVI, Washington, 1990, pp. 873~876

曼·芬纳(Herman Finer)的《杜勒斯在苏伊士问题上的外交理论和实践》。^①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史学界掀起了一股重新评价艾森豪威尔的艾森豪威尔修正派思潮。很多学者开始发现艾森豪威尔远非他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对白宫日常事务不太管理的总统,而是一位活跃的最高行政官。他控制着政策制定的进程。理查德·伊默曼(Richard Immerman)的文章“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谁做决定?”巴顿·伯恩斯坦(Barton J. Bernstein)的文章“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及罗伯特·迪万(Robert A. Divine)的著作《艾森豪威尔和冷战》都阐述了上述观点。^② 在1995年出版的专门研究艾森豪威尔与苏伊士运河事件的《艾森豪威尔和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③一书中,作者科尔·金西德(Cole Kingseed)论证了艾森豪威尔修正派的观点,指出艾森豪威尔是所有事件的中心。是他,而不是国务卿在危机中制定了重要的外交政策。虽然他无法时刻控制他的国务卿对英国在危机中的外交地位表示同情,但他通过在联邦政府内组建安全部门而牢牢地控制着政策制定的进程。^④

必须指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运河危机决策中并无明显裂痕,杜勒斯作为国务卿对他的上司亦无抗命之举。既然如此,二人孰为主导之争,意义就不大了。

① Herman Finer, *Dulles over Suez: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 Diplomacy*. London, 1964.

② Richard Immerman, Eisenhower and Dulles: Who Made the Decisions? 载 *Political Psychology*, Autumn 1979; Barton J. Bernstein, Foreign Policy in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载 *Foreign Service Journal*, May 1973; Robert A. Divine, *Eisenhower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1981.

③ Cole C. Kingseed, *Eisenhower and the Suez Crisis of 1956*, Baton Rouge, 1995

④ 同上,第5页

三、研究的新思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西方对苏伊士运河危机与战争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政治与外交,而开始侧重外交决策的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以及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相互关系。^① 在有关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军事和战略史方面,以色列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学者对此有所建树。^② 他们的研究与探索会对英美外交史学产生影响。

随着经济在外交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围绕苏伊士危机与战争的经济外交逐渐引起关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戴安·孔兹(Diane Kunz)1991 年出版的《苏伊士危机的经济外交》一书。该书是一部从用经济管理国家事务本领的角度出发对危机进行研究的力作,^③曾在 1992 年获得美国外交史学家学会颁发的 Robert H. Ferrell 和 Myrna F. Bernath 两项图书奖。

贯穿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外交自始至终决定着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进程”(p. 2)。这一观点基于二战后国际经济体系所发生的基本结构变化。作者指出:美国现在已经是“西方世界的财政主人”(p. xi),一个巨大的债权国,控制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

① 如 David Carlton, *Britain and the Suez Crisis*, London, 1988; W. Roger Louis and R. Owen, *Suez 1956: The Crisis and Its Consequences*, Oxford, 1989; Ilan S. Troen and M. Shemesh, *The Suez-Sinai Crisis, 1956: Retrospective and Reappraisal*, London, 1990; Keith Kyle, *Suez*, New York, 1991.

② Stuart A. Cohen, A Still Stranger Aspect of Suez: British Operational Plans to Attack Israel, 1955 ~ 1956, 载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0, May 1988, pp. 261~281; Howard J. Dooley, Great Britain's Last Battle in the Middle East: Notes on Cabinet Planning in the Suez Crisis of 1956, *Ibid.*, 11, August 1989, pp. 486~517; Michael B. Oren, Canada,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Middle Eastern Arms Race), *Ibid.*, 12, May 1990, pp. 280~300

③ Diane B. Kunz, *The Economic Diplomacy of the Suez Crisis*, Chapel Hill, 1991.

苏伊士运河危机与英美关系

基金组织以及它自己的进出口银行，有着前所未有的财政来源。而英国则相反，它已经加入到了从属的债务国的行列。这虽然不是说它已失去了影响，但要想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它不得不依靠美国。作者分析说，英国势力的衰弱使它不得不依赖于美国，而它对获得美国支持的需求又使它丧失了政策的自主性，致使美国从一开始，尤其是在侵埃战争爆发以后用一系列的经济压力迫使英国按照美国的意图行事。

尽管《苏伊士危机的经济外交》过分强调了经济外交在运河危机和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也尽管它忽视了英国在这一事件中的经济方面和非经济方面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从而为美国能实施这样的外交手段提供了机会，但孔兹的这本书仍不失为研究运河危机中英美关系的一部杰出著作。

四、有关危机对英美同盟的影响的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苏伊士运河事件，尤其是美国在这一事件中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对英国的打击，使得英美同盟在危机结束后不复存在。加布里埃尔·科尔柯(Gabriel Kolko)在他的书中写道：“苏伊士运河危机导致了原本在中东就已支离破碎的英美同盟的结束，以及美国从务实目的出发担当起实际上是西方国家自封的对中东事务的管理责任。”^① 科尔柯也许是从美国取代英国利益的经济优势这一框架出发而提出自己观点的，但一些同冷战修正论毫无关系的苏伊士问题“专家”也对此得出相同的结论。在斯蒂文·弗赖伯格的眼中，美国的反殖民主义是“被用来当作一副在这

① Gabriel Kolko, *Confronting the Third Worl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80*, New York, 1988, p. 83